

国际共运史学百年

李景治主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组织编写

北京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名单

顾问：高 放 张汉清 曹长盛
李宗禹 张中云 张伟垣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明进 孔寒冰 向文华
李景治 张光明 胡振良
常欣欣 蒲国良

本书作者名单

（按章次排序）

李景治 王明进 蒲国良
向文华 邓 剑 孔寒冰
孙 瑞 李 全 高静宇
胡振良 张光明 常欣欣
官施仁

致读者

历史巨人的步伐即将迈向21世纪。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民历经沧桑，在奋起斗争中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曾被称为“沉睡的雄狮”的中国已经觉醒，并以其惊世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中国的学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昌盛和科学的繁荣竭智尽忠。《中国学术百年》这套书，正是试图对这一历史进程留下记录。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十余个学会的近百位专家学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可以在本世纪末将这套书奉献给读者了。一年多来，我们召开了几十次会议反复探讨，作者们不辞劳苦专心撰文，都是希望展现百年来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反思其曲折经历，总结其宝贵经验，为学界同仁提供有益启示。果能如此，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谨以此套书献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9年10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启蒙时期 (1921 年以前)	(1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知识与理论传入中国	(19)
第二节 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0)
第三节 五四时期文化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讨论	(42)
第四节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际共运史的学习与研究	(50)
第二章 我国对国际共运史的早期研究 (1921 ~ 1949 年)	(53)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	(53)
第二节 共产国际研究	(61)
第三节 巴黎公社研究	(65)
第三章 国际共运史研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1949 ~ 1956 年)	(69)
第一节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的讨论	(69)
第二节 对中苏同盟的评析	(73)
第三节 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76)

导 言

(一)

在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下简称国际共运史）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早在1899年，由外国资本家和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就介绍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经历了由零星的知识介绍到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以及借鉴各国的经验，吸取国际共运曲折与挫折的教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纪之交，回顾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我们从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反思，在更高的层面上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

把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浩瀚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学术资料中去全面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并给予客观而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还应注意国际共运史上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对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的影响。因此，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既要注意各个时期著作、论文和史料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观点，又要分析不同学者的史学思想；既要看到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观点，又要看到外部环境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一项相当艰

巨、繁重的工作。

对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的回顾或评述,在本书之前就有很多学者进行过尝试,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界著名专家高放教授在1986年就写了一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史导论》的论文,论述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算起140余年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共运史研究方法的概况。1990年,他又发表了《建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一文,对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另外,国内的其他学者也对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学术评析。例如,1986年《求索》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张胜祖的论文《中国人民对国际共运情况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中国人对国际共运知识的零星接触。1989年《世界史研究》第12期发表了高敬增的《十年来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概述》一文,对1979—1989年十年间我国学界对国际共运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全国还有不少学术期刊对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年度综述。还有的文章对国际共运史研究进行探索,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4期发表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报》1988年第4期发表的《如何深化国际共运史的研究》等。上述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本书根据学术研究的高潮与低潮和学术研究重点的变化,把20世纪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分成七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构架了本书的七章。

第一阶段,1921年之前,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处于启蒙

时期。

中国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零星地接触了国际共运史的情况。例如,王韬游历欧洲归来后译写了大批报道交香港《华字日报》发表,曾提到了巴黎公社。1873—1882年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提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第一国际,《万国公报》从1891年底以小说的形式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这是对国际共运最初的有理论性的介绍。^①

进入20世纪,我国报刊对国际共运的评介和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如朱执信在1905年11月26日出版的《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宋教仁在1906年6月的《民报》第6号上发表的介绍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万国大会党略史》等。十月革命后,我国介绍国际共运史的著作迅速增加,李大钊从1917年起发表介绍国际共运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稿有20多篇,如《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五一·May day运动史》等,1920年到1921年3月,他还在北大讲授《工人的国际运动》。瞿秋白等人在这时期也写了不少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稿。这一时期有很多报刊发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等,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浙江潮》、《江苏》、《民报》等,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新世纪》、《社会星》、《天义》等,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介绍最多的还是五四运动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例如,

^① 张胜祖:《中国人民对国际共运情况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载《求索》,1986年第1期。

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晨报》副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建设》、广东的《中华新报》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译著,如李季译的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等。

总起来讲,建党之前国际共运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零散而不系统。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国际共运史知识也得以迅速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个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处于早期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与介绍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以前深入,开始具有理论研究色彩,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壮大起了促进作用。《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从中共成立到1926年7月终刊的九期中发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不少著作,如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国际的历史地位和责任》。《晨报》副刊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发表了中共创始人瞿秋白发自苏俄的大量通讯达16万字之多,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中国青年》是团中央刊物,1923年10月创刊后积极向中国青年介绍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发表了邓中夏的《列宁年谱》、硕夫的《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任弼时的《列宁与十月革命》等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从1924年2月创刊到1930年3月共出55期,也介绍了国际共运的不少知识,如周恩来的《列宁死后的苏联》、《将开的国际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等。此外这一时期刊登国际共运史研究或介绍方面文章的刊物,还

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共北京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等,这些刊物还经常出专号,对某些问题作集中介绍或研究,如《新青年》出了《共产国际》专号和《世界革命》专号,《晨报》副刊出了纪念俄国革命五周年的《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了《李卜克内西纪念特刊》、《纪念列宁逝世周年》专号、《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特号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形势严峻,上述刊物相继停刊或变质。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和介绍陷于沉寂。1930年上海春潮书店出版了由刘侃译的桑巴特著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国统区由于国民党查禁进步书籍,鲜有国际共运方面的书籍出版,更遑论研究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延安时期我党开始重视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1936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曾开设联共(布)党史课程,1938年5月成立了马列学院,开了近代革命史课程,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1939年底即有了中译本,延安整风期间,《教程》的结束语被定为整风的文献之一。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还号召全党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要懂得外国革命史。他认为学习国际革命的经验要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认为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范,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①。当时,国际共运史研究所涉及的面是比较窄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我国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与此相适应,学习、宣传苏联经验,歌颂中苏友好、歌颂斯大林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报刊涉及国际共运研究的文章多体现了这一主题,如艾思奇的文章《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7日)、沈钧儒的文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从苏联找到了真理》(《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2日)、柯柏年《斯大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3日),还有北京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等。联共(布)党史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但较多的成果都是对列宁、斯大林论述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诠释,缺乏创见。

除了学习苏联、歌颂苏联和斯大林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国际工运及国际共运史经验的重要著作的读物,如柯柏年的《介绍〈共产党宣言〉》、《介绍〈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等,世界近现代史教材都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国际共运、国际工运方面的内容。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专题论文,如1955年《新史学通讯》发表了关勋夏的《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的特征》、1956年《历史研究》上发表杨立文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等。这一时期还有些文章联系国内外实际阐述历史经验,例如,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长江日报》在3月18日刊登了龙潜的文章《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国人民大学《科学集刊》第二集发表高放的文章《从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历史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当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关系时,韩承文在1955年发表了《如何认识南斯拉夫》一文。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就研究方法而论主要是对经典著作诠释,从研究对象上讲主要是

中苏关系和联共(布)党史。此外,研究作风上,还存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四阶段,从1956年至1966年,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进展但也存在倾向性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错误,指出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正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也与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而写的九篇评论中,就苏联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平共处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苏共观点。这一时期报刊还大批南斯拉夫。我国共运史界及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等。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对国际共运研究的重视,国际共运史的专业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在刘少奇同志的关心下国际共运史进了大学课堂,在高校形成了较强的研究队伍,同时中央机关也开始抽调力量从事国际共运史的研究。1953年中联部成立了编译室,主要负责向中央提供有关当代国际共运的资料。1960年中央编译局组建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料和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到《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共13本一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两册和贝拉·库恩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辛编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著作也得以出版。研究国际共运的学术论文也较多地在报刊上出现。高放教授认为,到6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已开始了独立研究阶段。^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凭主观臆断来剪裁历史的倾向。从60年代初起,为了配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央编译局出版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丛书,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都包括在内,甚至还选进了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言论。当时还出版了一套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大多也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这时开始出现强调国际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还有些不恰当地撇开国际共运史为“左”倾错误提供依据的文章。如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时,张春桥曾援引巴黎公社关于公职人员薪金的规定反对按劳分配的原则等。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和一支专业研究队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研究中带有越来越强的片面性。

第五阶段,从1966至1978年,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出现倒退,被严重扭曲。

这一时期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实际上已陷于停顿,国际共运的有关知识被用来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片面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把暴力革命说

成是世界革命唯一道路。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甚至出现歪曲历史、剪裁历史和用历史为“左”倾错误服务的反常现象。

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还形成了一股神化领袖,妖魔化另外一些历史人物的坏风气。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先知,正确路线的化身,并认为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对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物的功绩一笔勾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些十分著名的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及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不加具体分析地都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扣帽式的批判。

此外,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大搞路线斗争。出于现实政治斗争和推行“左”倾路线的需要,把国际共运史描绘成一部路线斗争史。当时出版了不少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讲解《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的读物。与此相联系大兴“影射史学”“比附史学”。往往把现实中极左文章比拟为历史上的光辉文献,如把康生炮制的某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说成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的宣言”;上海的造反派夺取政权后自比巴黎公社而成立所谓的“上海公社”;为了比附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对国际共运史的历史人物也推出了十个“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发行了《纳吉与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小册子,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二十年前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四人帮”还借批外修来批内修,策划编写一套“机会主义头子”的传记来影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一些老干部。

以上这些现象严重摧残和扭曲了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六阶段,1979至1989年,这是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

^① 高放:《建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

春天，国际共运史研究处于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国际共运史学界带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机构，研究力量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频繁，在研究中逐步克服了“左”的流毒，正本清源，还国际共运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党校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共运史教研室和研究所，各高校中马列、科社、党史、政教、苏东等系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共运进行研究。中央编译局于1979年成立了国际共运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该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于1984年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全国总工会恢复了国际工运研究室的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也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到80年代中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研究的专业人员达2000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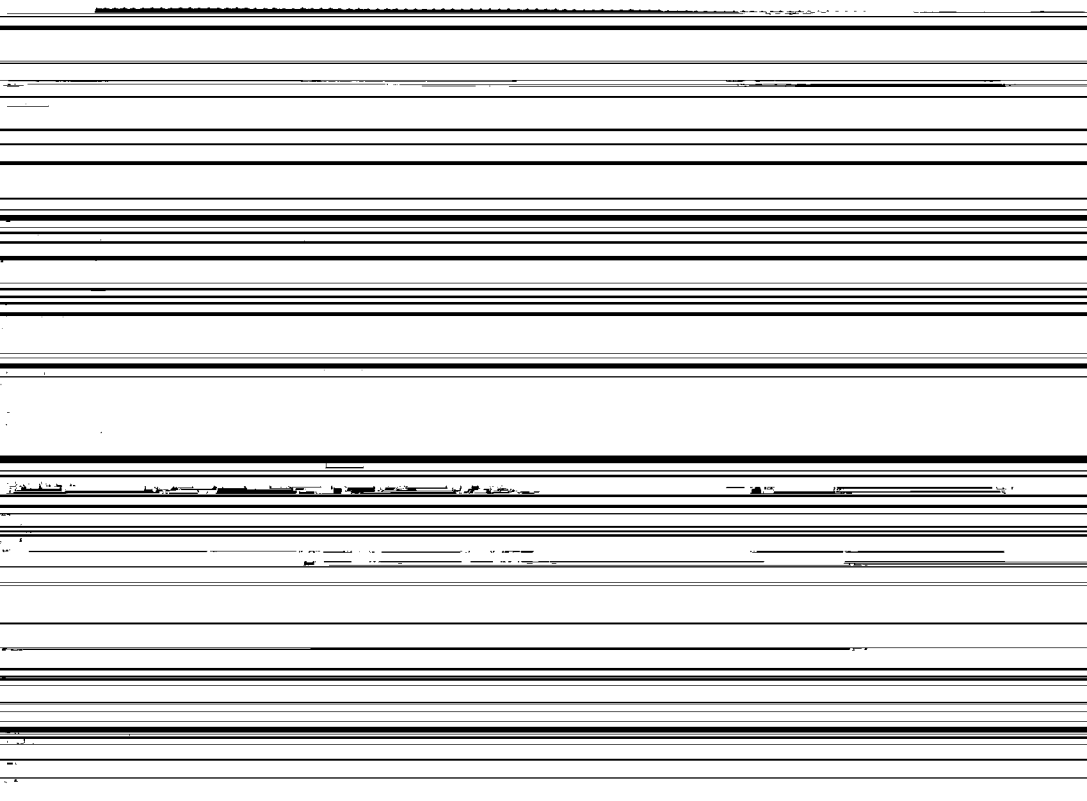
其次，学术活动增多。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研究力量增强，全国各地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成立。1982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1984年又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之下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国际共运研究。这些学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其他各种专题性的学术活动也不断举行。如1979年11月到1980年7月北京市部分高校国际共运史教师举行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论战问题的讨论；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等单位举办了布哈林研究班。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多次举行。

第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全国各地出版的国际共运

史、国际工运史教材三十余种，还有多种宣传国际共运知识的通俗读物以及一批国际共运方面的工具书如《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辞典》等。国际共运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是各种专著，这些专著包括对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波匈事件等重大事件的研究，也包括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研究，还包括对革命导师及其他国际共运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及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等。这些专著的出现表明我国国际共运研究的深度。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大量国际共运史方面的资料，如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发起组织、多家单位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计划出版60卷，现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3卷等。还翻译出版了拉法格、卢森堡等国际共运活动家的著作，以及国外学者国际共运方面的研究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千篇之多。

第四，国际共运专业刊物增多。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的丛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国际共运教研参考》，这两种刊物经改名、合并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与中央编译局合办。中联部于1981年创办《共运资料选译》月刊，后改名为《政党与当代世界》，山东大学1984年6月创办了《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山东省聊城师院从1985年创办《共产国际研究资料》，从1987年起更名为《共产国际研究》，另外，上海华东师大苏东所《今日苏联东欧》、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主办的《苏联东欧问题》和《苏联东欧译丛》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国际共运史的专业刊物。

第五，突破了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长期束缚。这一时期学术界就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对长期以来不敢涉足的



局面不是偶然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明确,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降温是必然的。然而,今后尽管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减少,但国际共运史的正常研究仍将继续进行。

第二,苏东剧变之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减少,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在进行多方面的调整,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因此也受到影响。80年代国际共运研究主要是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跟踪研究,比较中国和它们改革的异同,借鉴它们改革的经验,吸取它们的教训。进入90年代,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失败,而中国则在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阔步前进,这使得国内对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需求减少,我国公众关注的热点越来越集中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找不到答案。从这一意义上讲,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规模相对缩小也是正常的。

第三,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经过长期的发展,受政治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是这一学科走向成熟的表现。改革开放前,国际共运史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政治指挥棒转,根本谈不上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者越来越敢于争鸣,到90年代,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在研究中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些人在研究中能迅速接受新观点、采用新方法,但往往受西方的影响较大,观点容易偏激。更多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但同时又能注意到变化了的现实,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分析和研究问题,这是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主流。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例,有些人倾向于完全肯定苏联,甚至为苏联的错

误进行辩解,有时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表示担忧。而有些人则正好相反,例如《北京观察》1998年第1期有篇文章《〈共产党宣言〉的误读与误读苏联》认为,苏联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封建主义的。大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苏联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带有封建色彩,因此既不应全盘肯定,也不应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虽相差较大,有时甚至完全对立,但在学术研究、学术争鸣中都能存在,都占有一席之地,这正是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当前,国际共运虽然处于低潮,但在低潮中仍有发展和创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运动的低潮常常会提出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高潮。当前,我们需要总结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遭受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需要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需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等问题。把国际共运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是当前国际共运史学界的任务。通过总结百年来国际共运研究的经验,我们认为今后的国际共运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马列主义是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根本的指南,离开它的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就会迷失方向,得出错误的结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历史经验,把国际共运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保证。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才能敢于踏破国际共运研究的禁区还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做到不惟书,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或领袖人物在特定情况下对特定事物而讲的话。为此,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倾向,教条主义不是从历史的真实出发,而是从领袖人物

的论述中寻找现成的答案,把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所讲的话当做普遍性的真理,不是联系已变化了的现实去研究问题,而是因循守旧,照搬前人或教科书上的说法,不去进行认真独立地思考和研究。教条主义往往把自己扮成马列主义的捍卫者,难以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在研究中厚古薄今,甚至对党改革开放的路线持怀疑态度。二是要反对虚无主义倾向。虚无主义者看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例如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给历史留下的只是一段空白,苏联剧变又使苏联回到了十月革命前。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否定也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违背的,且极易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立场的影响。

第二,在研究中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反对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在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往往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剪裁历史、歪曲历史。例如把当代国际共运中某些与我国观点不一致的人物比作伯恩斯坦而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在引证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时,往往不具体分析他们说这些话时的具体情况,而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出发随意取舍,断章取义,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第三,国际共运史研究要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研究重心要更加贴近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除继续进行系统的基础性研究外,实证性、应用性的研究应得到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跟踪研究和政策性、对策性调研要占据重要地位,为我国改革开放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同时应注意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国际共运史研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射史学盛行,根本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

取。

第四,要允许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言堂是对学术研究的压制。在学术研究中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这是学术研究得以进行的条件。对许多问题展开争论,表明学术思想活跃。既不囿于旧说,又不随意附和别人,才能产生新见解,新思想,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这样,我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才能走向新的繁荣。

第一章

我国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启蒙时期 (1921 年以前)

中国人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最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多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得到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的介绍就不能不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著作。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情况便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同时介绍到中国来了。这时,中国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情况尚不甚了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还只是零零星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面知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谈不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相继转向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的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探讨和初步的研究。同时,共产主义者的对立面也从否定的立场出发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第一节 社会主义知识与理论传入中国

(一) 社会主义知识在中国的零星介绍

马克思主义创立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对这一迅即震荡欧陆的强劲力量尚一无所知。然而,国门既开,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也伴随着欧风美雨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由流传到广泛传播,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国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零星接触,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是关于 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当时,同文馆毕业的法语翻译张德彝随使法国,亲眼目睹了惊心动魄的巴黎公社革命,并在其所著《随使法国记》中做了生动的描述。几乎同时,游历法国归来的王韬与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合作,“午夜一灯,迺笔臆写”,译撰了有关普法战争的大批报导,刊载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随后,王韬又将这些报导汇集补充,编成《普法战记》刊行国内,其中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巴黎公社革命的情况。

随后,有关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导日渐增多。当时国内出版西学书刊的主要有清政府办的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和广学会三家。广学会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而前两者也分别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当时中国西学的翻译和出版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控制的。但是,社会主义知识在它们的译介中不自觉地得到了扩散,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的术语概念在诸多书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由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

编》，自1873至1882年初，逐周汇总各国的重要时事，不定期出版，是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现状的一个窗口。在这个刊物里，人们不时可以看到欧美工人罢工和斗争的消息。该刊物还报导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强行通过《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等事件。这些报导中提到的“康密尼党”、“康密尼人”等，是对“共产主义者”的最初音译，“主欧罗巴大同之议者”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译”，而其中所称的“主贫富均财之说”、“贫富适均”、“主欧罗巴大同”等等则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概括。差不多与此同时出版的《佐治刍言》、《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中，关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多有提及，如“一国产业必与一国平分”、“所在结社，主张四海兄弟，人民同等之说”、“欲使全世界为一大劳动公会，以废政府律法习惯等”，如此等等。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中文刊物上谈到社会主义的文章数量大增，如载于《万国公报》上的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纪略》，英国传教士林先后发表的《以地租征利论》、《再论以地征租之利》、《富民策》、《各家富国策辩》、《地工本之说》等文以及《时务报》、《北中国每日报》、《译书公会报》等报刊有关《社会党开万国大会》、《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弹压虚无党议》的消息报导等等。1899年2月至5月，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上连载了由李提摩大根据英国人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前3章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并于下半年出版了线装单行本。由于基德在原书中曾引述了马克思的言论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所以《大同学》中也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其中马克思被译为“马克思”或“马客德”，恩格斯则被译为“恩格斯”或“音盖尔”。文章说，“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德，主于资本者也”，并称马克思为“百

工领袖”。文中所谓“安民新学”，说的便是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指的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

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内，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知识有所涉及的，差不多全是传教士。而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著述里对社会主义的反映却相当少。但是，中国人毕竟开始接触激荡于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了。中国驻德使臣李凤苞在其1878年和1879年的日记中就曾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有所记述。他在记述中把社会民主党音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或“莎舍尔德玛噶里会”，把俄国的“民意党”译为“尼赫力士”，把法国的“共产主义”译为“廓密尼士”，并称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是“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受《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这时的康有为也“始演大同之义”、“手定大同之制”。1895年，留英回国的严复在其《原强》一书中也涉及到了西方社会阶级斗争的趋势，但没有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1896~1897年间，孙中山有美欧之行，并于1897年1月至7月留居英国伦敦，埋头于大英博物馆。他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之运动也”。于是便萌生了他的民生主义思想。

19世纪末，中国的诸多书刊越来越多地谈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思潮也开始引起中国人的越来越多的注意。在戊戌维新的热潮中，许多报刊都有意识地报导过欧美无产阶级斗争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也对进一步了解和考察这一风靡于西方的社会思潮日渐发生了兴趣。

（二）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社会主义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896年，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到达日本。此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06~1907年间，已达8500多人。其中80%以上是自费生。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是以救国救民为志向的，他们对当时正风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8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许多有志之士东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热潮同样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与刚从欧洲返日的孙中山找到了某种共同语言。改良派与革命派差不多同时都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中国人自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研究首先是在日本开始的，其后才逐渐在国内得到广泛的宣传。

1900年7月，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字样。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1901年1月出版的《译书汇编》第2期上刊载了该社所译日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第3章《社会党镇压及社会政治》。其中第一节《社会党由来》谈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一国际（万国工人总会），也提到了马克思（麦克斯）与拉萨尔（拉司米）。文中称马克思“倡均富之说”，是“万国工人总会”的“参事会长，总理全体”。文中小序中还解释说，“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

1901年以后，《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等改良派主办的报纸上与《浙江潮》、《江苏》、《民报》等革命派主办的报纸上陆续刊载了大量涉及和介绍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文章。

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7号发表的梁启超的《干涉与放任》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

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将全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把“社会主义”视为“干涉主义”，这是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解释。紧接着，他在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中又称“麦喀士（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此后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又多次谈到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称社会主义为今日世界一大问题，是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1903年2月，《译书汇编》发表了马君武的一篇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今译傅立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今译路易·勃朗）、布鲁东（今译蒲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萨勒（今译拉萨尔）、马克司（马克思）”。文章认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文章还介绍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最后列举了著名社会主义者的26部著作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的参考。其中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5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这个包括26部社会主义著作的书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书目，也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目。2月至4月间，上海《新世界学报》上刊登的杜士珍《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中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欧洲的各社会主义流派。文中指

^① 马君武在谈文中将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误认为是马克思的著作了。